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20年9月14日至10月2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发展权

发展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发展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萨阿德·阿勒法拉吉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3/14 号 and 第 42/23 号决议向理事会提交本报告。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从发展权的角度审查了国家一级的发展筹资做法。他着重指出了良好做法，并评估了在确保权利持有人有效参与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最后，他就将发展权纳入资源调动、税收政策、参与和获取信息等领域提出了建议。



一.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3/14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概述了发展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活动。自开始执行任务以来，特别报告员一直专注于制定具体的国家访问方法，以评估发展权的落实情况。他已经发出了访问 20 多个国家的请求，并高兴地看到大多数请求得到了积极的答复。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对瑞士进行了国家访问，以评估该国为将发展权纳入其政策所做的工作。这是自规定了这项任务以来的第二次国家访问。特别报告员还审查了政府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促进和保障有效的民众参与和问责。国家访问报告正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访问原计划于 2020 年 5 月进行，但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旅行限制，不得不推迟。

2. 人权理事会在第 33/14 号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推动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的工作。特别报告员计划参加原定于 2020 年 5 月举行的工作组第二十一届会议；但会议已推迟到 2020 年 11 月。

3. 2018 年 9 月，人权理事会通过第 39/9 号决议，请特别报告员参与与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关的国际对话和政策论坛，以加强将发展权纳入这些论坛和对话的工作。为此，特别报告员于 2019 年 10 月 7 日参加了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举办的为期一天的会议，讨论能否利用未归还的非法资金问题，包括为此货币化和设立投资基金。特别报告员根据他于 2019 年 9 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切实落实发展权的指导方针(A/HRC/42/38, 第三节)，向咨询委员会通报了他的最新工作情况，并就会议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4. 2019 年 11 月 11 日和 12 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组织的关于落实发展权以加强东盟共同体的协商。特别报告员作了主旨发言，并作为发言者参加了关于理解发展权及其与东盟区域主义背景下基于人权的发展方针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的小组讨论。该活动的目标是：加强《东盟人权宣言》的执行力度；获得关于落实《宣言》第 35 至 37 条所载发展权的规范性内容和进展情况的反馈；确定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和部门机构可为缩小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而采取的步骤；监测和衡量在落实发展权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5. 2020 年 2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在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不结盟国家运动日内瓦分会主席身份组织的关于发展权及其实际落实方式的不限成员名额讨论会上作了主旨发言。

二. 发展筹资和发展权

A. 引言

6. 人权理事会第 33/14 号决议规定，发展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是审查发展筹资与发展权的交集情况。¹ 在《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2 段中，各国承诺执行三方面任务：履行《蒙特雷共识》和《多哈宣言》的承诺并评估二者的执行进度；进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筹资框架和 2015 年后普遍发展议程的实施手段；重振和加强发展筹资后续进程，以确保以适当、包容、及时和透明的方式执行和审查它们所承诺的行动。

7. 特别报告员回顾，其审查结果指出个人和社区必须推动自身发展进程，这关系到如何筹措发展资金(A/HRC/42/38, 第 11 段)。为本报告的目的，特别报告员将探究各国在其进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筹资框架的国家努力中执行上述任务的方式以及 2015 年后普遍发展议程的执行手段。他的目的是评估利益攸关方将发展权纳入国家一级发展筹资做法的情况。他扩展了他以前关于实际落实发展权的工作，汇编了各国、国家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良好做法。特别报告员还审查了利益攸关方面面临的挑战，并将基于发展权的观点纳入发展筹资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8.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提到发展筹资包括国内和国际资金流动，如国内财政收入、公共发展援助、汇款、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债。² 特别报告员指出，外债问题是发展筹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不会侧重于这一议题领域，因为他在这方面提到了各国外债和其他相关国际财政义务对充分享有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的工作。

9. 特别报告员对 COVID-19 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国在应对这一危机时不让任何人掉队。³ 特别报告员还确认，这一大流行病将对发展筹资产生深远影响，并将在其即将提交大会的报告中从发展权的角度审查这些影响。

10. 本报告详述了特别报告员于 2019 年 9 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切实落实发展权的指导方针及其所载建议。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6/9 号决议的授权，特别报告员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开展了区域协商，形成了这些指导方针。⁴ 协商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参加者汇聚一堂，其间他们确定了在设计、执行、监测和评估有助于实现发展权的政策和方案方面的良好做法。

¹ 另见“联合国发展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任务简介”(2017 年)。

²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其他融资来源，如慈善事业。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他着重谈到上述类型。

³ 人权高专办，“‘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联合国专家敦促各国在应对 COVID-19 危机时不忘承诺”，新闻稿(2020 年 4 月 9 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86&LangID=E。

⁴ 另见 www.ohchr.org/EN/Issues/Development/SRDevelopment/Pages/RegionalConsultation.aspx。

11. 指导方针强调了权利持有人切实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中心意义。确保有切实参与不仅仅意味着同个人和社区协商。它还意味着将二者置于影响其自身发展的决策中心，其中包括发展筹资决策。实际上，特别报告员在指导方针中将发展构想为一个整体进程，需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成员和私营部门在内的不同利益攸关方的投入和参与，以实现可持续的成果。对于向社会各阶层开放的参与性协商进程，必须在推进的每一步进行设想、预算编制和实施。

12. 指导方针明确指出，从发展权的角度来看，发展筹资意味着为个人和社区表达的发展优先事项筹资，因为他们必须推动自身发展的进程。在下面一节中，特别报告员介绍了相关国际标准如何已经纳入了这一做法。

B. 关于发展筹资和发展权的国际政策背景

13. 适用于发展权与发展筹资相交集的国际政策背景文书包括《发展权利宣言》、《2030年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14. 《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指出，根据发展权，所有人和各国人民都有权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宣言》还概述了指导发展筹资政策决定的原则。例如，它指出，发展权意味着各国人民充分实现自决，其中包括在符合国际人权两公约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各国人民对享有对其所有自然财富和资源的充分主权的权利(第1条)，而发展的惠益应公平分配(第2条)。它宣布，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实发展权，并确保所有人机会平等(第8条)。此外，在国际一级，该《宣言》规定各国负有义务相互合作，包括在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快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向这些国家提供适当手段和设施以促进其全面发展方面(第3(3)和4(2)条)。

15. 在《2030年议程》中，发展权与可持续性之间有着切实的联系。《2030年议程》通篇重申《发展权利宣言》的主要原则。它还确认需要建立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其基础是尊重人权(包括发展权)、在各级实行有效的法治和善治以及透明、有效和负责的机构。⁵

16.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与《2030年议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全球发展筹资框架，其中包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筹资。与《2030年议程》类似，《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18段提到善治、法治、人权、基本自由和平等诉诸司法的机会是促进和平与包容性社会努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发展权的基本要素是发展筹资国际框架的基础。

17. 这些国际标准表明了各国先前对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筹资采取基于权利的方法的承诺。在以下各节中，特别报告员评估了在发展筹资领域落实发展权的具体例子，以证明各国如何将这些承诺付诸实践，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

⁵ 见若干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纪念《发展权利宣言》发表三十三周年所发表的声明(2019年12月4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383&LangID=E。

C. 国家一级做法

18. 为了收集有关在多大程度上将权利持有人置于发展筹资决策中心的信息，特别报告员呼吁会员国、发展融资机构、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学者提交意见。他询问了以下情况：

- (a) 个人和社区参与及获得有关发展筹资进程的信息；
- (b) 政府资源调集和发展预算编制；
- (c) 涉及人权的国家税收政策；
- (d) 发展筹资利益攸关方如何分享发展惠益，以及社会保障方案的状况。

19. 一些国家提供了实例，说明其政府如何努力将发展权纳入国家发展筹资系统。特别报告员感谢为编写本报告提供信息的所有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⁶ 他认识到 2020 年在世界各地蔓延的 COVID-19 大流行使许多国家需要重新调整资源方向，但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收到更多提交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可使他能够提供更多各国可在其特定情况下调整和采用的良好做法的例子。

20.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政府在其提交的信息中报告说，其《宪法》第 306 条规定，国家将通过在社会、卫生、教育和文化政策中公平地重新分配经济盈余来确保发展。第 316 条规定，国家应促进公平分配国家财富和经济资源的政策，以防止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排斥，并从多个方面消除贫困。

21. 2015 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启动了《2025 年爱国议程》，这是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计划。2016-202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促进了《爱国议程》的实施，并规定协调私营行为体、社区、社会合作社和社会组织，包括当地土著农民部族和人民的组织以及跨文化和非裔玻利维亚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还包括关于性别平等、老龄化和机会平等以及尊重人权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交叉领域的全面规划办法。

22. 关于国家全面规划系统的第 777 号法律要求实施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重点是综合规划，有社会行为体参与并与之协调。该法概述了部门、国土和机构规划的方法和技术准则，并确立了规划进程发展的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此举促成了根据确定的优先事项进行投资管理。关于社会参与和监督的第 341 号法律旨在增强社会参与和监督，将其作为公共管理在规划、监测和评价公共政策、国家行动和私营公司提供服务方面的一个贯穿各领域的连续要素。

23.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方案表明了对社会和经济包容的政治承诺。这些方案包括一项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方案，以鼓励学生留在学校；对孕妇和 2 岁以下儿童实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同时由公共卫生服务部门进行定期健康检查；为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制定支付方案，以降低其陷入贫困的风险；对残疾人提供资金援助。

⁶ 提交的信息可查阅 www.ohchr.org/EN/Issues/Environment/SREnvironment/Pages/SafeClimate.aspx。

24. 关于透明度,《宪法》第 21 条规定人人有权获取信息,国家通过第 106 条保障了通信权和信息权。第 242 条提到了参与和社会监督在支持公共管理所有领域的信息透明管理和资源使用方面发挥的作用。《宪法》保护不受限制地从公共实体获取信息的权利,并赋予社会组织和民间社会参与和行使社会监督的权力,无论是在制定计划还是监测取得的成果方面都是如此。

25. 经济事务和公共财政部通过交流经验、知识和技术,在技术和科学方面着力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26. 布隆迪政府在其提交的资料中介绍了布隆迪 2018-2027 年《国家发展计划》,该国根据这一计划开展了政策评价,提供了税收激励并进行了对人权的影响评估。该计划还包括就业、体面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等目标。若干计划与《国家发展计划》挂钩并支持其实施,包括《公共投资计划》、社区发展计划和战略部门计划。2015-2020 年《国家金融普惠战略》正在修订中。政府在通过新的融资法律之后,通过在全国所有省份举办的讲习班传播信息。

27. 政府实施了关于公私伙伴关系合同总制度的第 1/19 号法律,以保证公私伙伴关系合同签署过程的透明度,并创建了通过《国家发展计划》吸引投资者的平台。负责公私伙伴关系的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网站,民间社会可在上面获取有关过去和正在进行的公私伙伴关系项目的信息。

28. 考虑到紧缩方案和公私伙伴关系的潜在弱点,政府已采取措施,通过修订所得税和增值税以及解决避税问题等措施,扩大其税基和增加内部资源。有关征税、税收激励和大型行为体产生的收入的信息可在网上查阅。

29. 在向公众分配收入方面,政府列出了针对低收入人口的项目,例如为年轻人设立银行以及为妇女设立银行的计划。政府还向乡村的家庭农业拨款,并为潜在的企业所有人赞助创业课程。

30. 智利政府在提交的资料中重点介绍了国家福利分配和社会保障措施。它列举了许多社会保障方案和相关统计数据。例如,政府介绍,截至 2018 年 12 月,总共 448 个方案和倡议中有 289 个报告了供受益人参与的措施和/或机制。

31. 智利通过报告信息和数据,将基于人权的方法纳入国家社会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工作。即社会方案必须提供有关其人权措施的资料,以及关于性别、土著人民、国土视角、残疾人状况、移民和儿童与青少年状况的背景资料。

32. 该国政府还说,它要求提供关于社会方案如何有助于减轻多层面贫困的信息。衡量这类贫困的依据是与教育、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住房和环境以及网络和社会融合有关的指标。2018 年,在 448 个社会方案中,只有 212 个被确定为有助于减少多层面贫困的一些根源。

33. 智利推动维持、改进和增加社会保障的最低标准,即使在危机时期也是如此。政府力求确保最弱势群体获得社会福利,并提供了智利全面儿童保护系统的范例“与你一起成长”。该系统的任务是协助、保护和支持儿童和家庭,重点支持弱势群体。另一个方案“智利关爱”是通过“地方支助和关爱网络”实施的,这是

一项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和全面照顾受扶养人，包括 60 岁以上的受扶养人和处于受扶养状态的人，以及任何年龄的残疾人。该网络的行动包括受扶养人的无偿照顾者和/或这些人的支助网络，以改善家庭单位的生活质量。

34. 在合作领域，智利政府强调其联合合作基金使该国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多样化。其中包括智利消除饥饿和贫困基金，这是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伙伴关系，与《2030 年议程》保持一致。它通过透明的提案征集和入门讲习班让智利民间社会组织参与进来。

35. 哥伦比亚政府提到其题为“哥伦比亚契约、实现公平契约”的《2018-2022 年国家发展计划》。全国经济和社会政策委员会制定了哥伦比亚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指导：监测和报告制度；加强统计计划；支持地方政府实现发展目标的土地战略；促进与非政府行为体对话的指导方针。

36. 政府将私营部门描述为通过公私伙伴关系资助和执行可持续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伟大盟友。政府报告说，它促进了私营部门参与与水 and 基本卫生设施有关的项目，扩大了教育基础设施，建造了医院和紧急护理中心以及发光二极管照明项目。

37. 政府强调，它致力于支持地方一级的发展。例如，其国土规划工具包为地方当局提供了改进发展计划制定过程的方法、格式和实用工具。该工具包已于 2019 年重新设计，更新后的版本允许在线制定该国所有的土地发展计划。它还提供了教育工具，并为技术援助、特别是从部委一级向市政当局提供的援助提供了便利。

38. 《国家发展计划》包含一项妇女平等专约，其中包括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8 项贯穿各领域的政策。在美洲开发银行、世界经济论坛和私营部门行为体的支持下，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启动了一项解决工作场所性别均等问题的举措。该举措力求查明并减少阻碍妇女获得劳动机会和平等条件的障碍。

39. 该国政府强调，有必要加强发展筹资方面的国际合作，并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对哥伦比亚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仍然至关重要。政府认为，调动财政和实物资源是一个存在重大问题的领域，并呼吁确保将科学、创新、知识和技术应用于为人类和地球服务。

40. 古巴政府报告说，“2016-2021 年党和革命经济和社会政策准则”指导了该国的发展战略，并规定公司及合作社必须向其经营所在地的市政管理委员会缴纳土地税，以促进地方发展，并为经常开支和资本开支提供资金。

41. 《宪法》授权市人大完成如下任务：就地方利益问题召开公众协商会；保证对民众的提案、投诉和请求给予适当关注；保障该市居民向人大提出对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的分析的权利；持续为民众提供关于政府机构做出的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的充分信息。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项关于市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和运作的法律，加强了市政自治以及个人和社区参与地方发展的能力。

42. 2020 年，国家已着手制定一项更加灵活和参与性更强的经济计划，确定每个地区和企业为提高生产率方面的优势。政府将以下方面列为优先事项：增加出口

和使出口多样化、提高投资过程的效率、增加民族工业的参与、加强地方发展项目以及促进所有经济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包括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行为体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联系。为了增加外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直接投资，2020年1月启动了国外投资一站式服务。一站式服务的目的是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并帮助加快新企业的审批程序。一站式服务旨在整合出口货物和服务的流程，消除贸易中的内部障碍和过度的官僚体系。

43. 古巴提请注意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实施的封锁对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古巴政府还提请注意发达国家未能履行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政府强调，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持续存在的平等现象侵犯了发展权。

44. 塞浦路斯政府在其提交的资料中报告说，它在评估税收政策和财政激励措施时开展了公众协商，并记录了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和预算的影响。塞浦路斯还通过在各部委网站上公布数据来增加透明度。⁷

45. 厄瓜多尔政府报告说，根据《宪法》，国家有义务规划国家发展、消除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及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再分配。《宪法》还确定了需优先和特别关注的群体：老年人、儿童和青少年、孕妇、残疾人、被剥夺自由者、患有极严重疾病或高度复杂疾病者、面临风险者、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与虐待儿童行为及天灾人祸的受害者。国家必须为双重脆弱者提供特殊保护。

46. 题为“终生计划”的《2017-2021年国家发展计划》以环境可持续性和国土发展为基础，分为3个方案领域和9个国家发展目标。第一个领域是“人人享有终生权利”，规定了保护弱势群体，肯定了多元文化主义和跨文化性，旨在消除所有层面的贫困和所有类型的歧视和暴力，并保障自然权利。第二个领域是“为社会服务的经济”，旨在巩固基于团结的社会经济体系，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创造体面就业，捍卫美元化和公平地重新分配财富。它还旨在保障粮食主权和农村综合发展。第三个领域是“更发达的社会，更美好的国家”，促进了公民参与和建设以透明和团结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道德，一个提供优质服务 and 接受永久性社会对话的国家，以及主权与和平。

47. 《国家发展计划》确定了分配公共资源和投资的标准，它必须与可持续、高效和透明的公共财政管理相一致。资源分配必须与国家目标挂钩，并保证国家提供的服务可持续。这些标准还包括减少贫困、创造就业、建立与私营举措的互补、提高系统性生产力和增加国内投入的使用。

48. 政府确认了土地不平等带来的挑战和提高地方发展能力的必要性。因此，国土发展是《国家发展计划》框架内的一个贯穿各领域支柱，该计划为公共政策的设计和执​​行提供了系统的办法，涉及到每个地区的背景和需要。

49. 厄瓜多尔最近改革了其税制，于2019年12月颁布了关于税收简化和累进的法律。变革的例子包括一项新的计划，即在使用电子收据进行的交易中，为老年

⁷ 没有提供有关协商方式的更多详情。

人和残疾人自动退还增值税。该法律还对医疗用品适用 0% 的增值税率，以便糖尿病患者和心脏病患者可以较低成本获得此类用品。

50. 寻求税收优惠或降低关税的投资公司必须满足各项要求，如创造新的就业。承担保留会计记录的法律义务的公司不能将利润分配给股东，除非已向工人支付了最低生活工资。政府表示，它已颁布了吸引投资的措施，包括一系列临时税收激励措施和仲裁法。它还与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促进私营部门投资和获得信贷。

51. 在获取信息领域，由经济事务和财政部推出的指导平等政策支出的分类法是一种预算工具，用以确保分配用来缩小社会经济和平等差距的公共资源的透明。分类法的使用是强制性的，各机构逐渐习惯了它的使用。通过分类法报告的统计信息每天更新，并通过该部网站供公开查阅。

52. 意大利政府介绍了该国如何衡量贫困、不平等和社会包容的最新情况。2019 年 1 月，第 4/2019 号法令规定了基本收入，即意大利新的最低收入衡量标准。该法律为最弱势民众确定了适当的措施模式，旨在确保对边缘化人群的经济支持和社会包容。

53. 2015 年 11 月，政府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机构间合作，发布了消除严重边缘化现象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对使用公共或欧洲联盟资金的机构和利益攸关方具有约束力，鼓励加强与防止无家可归有关的社会和卫生服务。

54. 劳动和社会政策部、教育部和因诺琴蒂基金会推动了接纳和融合罗姆人、吉普赛人和游民的项目，该项目的基础是 2012-2020 年期间纳入这些群体的国家战略。该项目旨在为罗姆人、吉普赛人和游民儿童制定接纳程序，减少其面临的歧视和加强当地社区，为此在学校及罗姆人、吉普赛人和游民家庭和儿童以及社会服务之间建立融合。

55. 毛里塔尼亚政府介绍了 2016-2030 年期间实施发展政策的《加速增长和共享繁荣战略》。各利益攸关方参与了该战略的制定，包括部级部门发展委员会、行政代表、国家和地方代表、民间社会、私营部门行为体、学者、青年和妇女、移居国外的毛里塔尼亚人及技术和金融合作伙伴。

56. 为了减少极端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政府还通过了旨在降低弱势群体脆弱性和帮助他们应对风险的《国家社会保障战略》。政府表示，巨大的需求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对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和国家医疗保险基金而言。政府将很快建立一个社会登记册，以针对最贫困人口的不同社会保障干预措施为基础。

57. 毛里塔尼亚已采取措施，通过在部委官方网站上公布数据而确保权利持有人获得可靠和可理解的信息，为此加强国家统计系统，改进与发展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报告工作，同时考虑到最脆弱的人口。对《加速增长和共享繁荣战略》的行动计划每五年进行一次评价，以衡量其对人权、创造就业和工作条件的影响及效果。每年与民间社会、技术和财政伙伴以及部长级官员一起，编写关于政府政策和方案的评价报告。这些报告可在网上查阅。

58. 毛里求斯政府报告说，财政、经济规划和发展部每年在编制年度预算时都邀请各团体就制定政策和方案提出意见。随后，该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举行会议，讨论提交的提案，将这些提案纳入预算文件。政府的财政战略包括几项税收措施，这些措施旨在保持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及改进技术和数据的使用，以提高遵守率。在起草新法案或对现有法律的修正案时，要求政府各部通过会议或讲习班的形式，征求权利持有人的意见。有时，法案草案会发布在各部网站上，征求公众意见。

59. 政府的大多数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都是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实施的，一些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政府关于这类评估的指导方针要求与可能受到项目提案影响的民间社会和(或)公众进行磋商。评估清单可在环境、固体废物管理和气候变化部的网站上查阅。

60. 自 2009 年以来，毛里求斯要求各公司将其利润的 2%用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基金与非政府组织协作，支持贫困家庭、残疾人和弱势家庭的儿童。

61. 该国政府还强调了其与非洲各区域各经济共同体在与发展筹资有关的政策和规划方面的协调。外交、区域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促进与其他部委、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就区域和国际合作问题进行磋商。

62. 墨西哥政府强调了其《2019-2024 年国家发展计划》的编制工作。为编制该计划，政府在墨西哥各州和墨西哥驻美利坚合众国各领事馆举办了 84 次协商论坛。民间社会、土著社区、专家和公务员参加了论坛。该国的规划法律规定，各社会团体应参与和协商，这样它们能够就《国家发展计划》及由此产生的方案(如《国家发展筹资方案》)的规划、更新和执行发表意见。该国政府还报告说，根据《宪法》第 2 条，国家有义务与土著人民和社区就任何可能影响其法律权益的决定进行协商，将这些群体置于政府决策的中心。

63. 经济部国家微型企业家筹资方案信托基金规定，一名民间社会代表是基金的永久成员，有权在信托基金的最高机构——技术委员会发言和投票。社会方案也有社区参与和社会监测的具体机制。

64. 在地方一级，政府的发展和福利方案包括 13 000 个综合发展中心，联邦政府通过这些中心协调公共方案并向公众通报情况。这些中心为全国 18 万个社区提供服务，包括农村地区的社区。中心公务员到各地访问考察，并举行社区规划大会。公民大会的目标是促进知情、有组织和民主的社区参与，以便通过参与进行剖析并解决当地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65. 在执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政府力求让各发展进程之间具有相互关联性。福利部的方案基于以下行动：优先关注生活在土著和非裔墨西哥人为主的地区、边缘化程度较高或非常高的地区以及暴力程度较高地区的民众；不经过中间人而直接提供经济和实物支持；促进将受益人整合为一项普查，以便各机构执行贯穿各领域的行动；确定受益人和民众需求的地理位置；确保每个方案都有社区参与和社会监督的具体机制。

66. “公民预算”倡议的目的是以明确和透明的方式告知公民公共资源是如何使用的。“公民预算”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解释了联邦预算是如何编制的。2020年首次纳入纳瓦特尔语版，因为这是该国使用最广泛的土著语言。2020年还发布了英文版，以促进国际上对墨西哥的各项倡议提供反馈。墨西哥是第一个加入公开预算数据国际标准的国家，该标准是由财政透明度全球倡议与世界银行的“助推”倡议合作推动的。

67. 墨西哥金融情报局已采取措施追踪和查明非法资产，并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金融情报局是埃格蒙特集团的成员，与其他国家的金融情报部门分享关于预防、调查和打击洗钱的信息。政府还与其他国家签署了43项关于交换涉及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金融情报的谅解备忘录。

68. 菲律宾政府提供了关于其国家一级做法的信息，包括其国家金融普惠战略、与制定长期发展政策(2040年国家愿景)有关的进程、公众参与预算进程的情况以及确保财政透明度的工作。

69. 俄罗斯联邦政府报告说，在资助发展项目时，以伙伴国家的优先需求为指导。这一方针的基础是2014年经总统令确认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际发展援助国策的概念说明。只有在一国明确提出请求时才提供发展援助。为此考虑到相关国家是否有消除贫困方案和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70. 俄罗斯联邦采纳了《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的原则，即自主决策、协调实施、目标一致、追求实效、共同负责。发展项目以受援国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并根据相互商定的标准，与国家当局一起对其实效进行评价。俄罗斯联邦旨在让所有发展中国家平等获得有关发展援助机会的信息。一些项目由俄罗斯联邦向联合国业务基金和方案的捐款资助，这些项目的竞标信息在公开信息源上发布。

71. 俄罗斯联邦特别注意协调实施发展筹资方法。例如，俄罗斯联邦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资助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的一些项目。一个关于在2017-2019年期间加强独联体区域稳定金融发展潜力的项目旨在向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政府提供技术合作，以使其获得新的资金来源。2018-2020年期间在亚美尼亚的另一个项目力求促进从以发展援助为基础的筹资向其他发展筹资来源过渡。

72.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俄罗斯联邦通过工业债权国巴黎俱乐部参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减免和结构调整。巴黎俱乐部自成立以来所监管的5830亿美元中，俄罗斯联邦的份额为510亿美元。

73. 俄罗斯联邦已批准《税收事项行政互助公约》。2016年，俄罗斯联邦签署了关于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的多边主管当局协定。2019年，该国批准了《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

74. 芬兰基金是一家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发展筹资机构，由芬兰政府所有，芬兰外交部负责运营。芬兰基金报告说，它投资于在发展中国家运营的私营部门企业，并提供如何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专业知识。芬兰基金预计项目将获得盈利，

并特别强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部门，如清洁能源、可持续林业、可持续农业和金融服务，但该基金也投资于其他部门。

75. 芬兰基金报告说，它没有进行筹资干预的规划。相反，该基金鼓励接受投资方或借款公司支持和促进当地发展项目。芬兰基金还期望其客户向当地社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信息，在项目的不同阶段积极与他们接触，并向利益攸关方提供适当的申诉机制。

76. 该基金正在积极努力将人权视角纳入其投资程序，并通过资助促进性别平等的项目和公司来促进性别平等。芬兰基金发表了一份人权政策声明和一份性别平等声明。该基金还制定了一项税收政策，规定了负责任的纳税原则；并公布了接受投资方和借款公司在国家一级缴纳的税款。

77. 在批准一项投资之前，芬兰基金评估其对收入分配和包容性的潜在影响，并努力减轻其对人口中最脆弱群体造成的风险。在可能的情况下，该基金鼓励各公司参与利益分享计划。

78.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提交了关于彩虹项目的信息，该项目是赞比亚的一项参与性小额信贷计划。该项目协调当地社区组织支持弱势儿童和艾滋病孤儿。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强调了该项目的双轨方法。第一个轨道的小额贷款包括种子、化肥和工具等农业投入，并向家庭提供技术培训。之后，受助人以实物捐赠的方式偿还贷款，比如他们种植的作物的一部分。第二个轨道包括为家庭提供食物、教育和医疗卫生援助。在城市化程度更高的环境中，贷款支持了小型商业举措。

79. 该项目的治理结构确保所有相关决定都是在有受益方(个人和社区)参与的机制下作出的。他们参与需求评估、规划、实施和评价。双轨方法的基础是在社区一级进行的需求评估，受益方的参与使得能够更好地根据民众的实际需要调整方案。

三. 在发展筹资中落实发展权所面临的挑战

80. 特别报告员欢迎收到介绍国家一级发展筹资做法的资料。上述实例提供了一些良好做法，可用于实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涉及发展权的基本原则。在下文中，特别报告员回顾他在编写本报告前的协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挑战。

A. 资源调动

81. 甚至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各国在调动资源以资助发展和落实发展权方面就面临着严峻挑战。各国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强调了这些挑战，各国详细说明了其增加收入的各种战略，同时也强调需要大量外部支持(见上文第 28、39 和 42 段)。特别报告员回顾说，根据核心人权条约，各国负有义务最大限度地调动可用资源，以逐步实现人权，包括发展权。⁸ 《发展权利宣言》第 3 条第 3 款还明确指

⁸ 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缔约国义务性质的第 3(1990)号一般性意见；《儿童权利公约》，第 4 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四条第二款。

出，各国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22 段中，各国承诺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能力的努力。国家间国际合作的这一方面对于在发展筹资中落实发展权至关重要，因为提交的材料表明，一些国家目前没有足够的国内收入，或不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增加收入，因此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⁹

82. 因此，官方发展援助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报告员回顾捐助国对支持发展中国家作出的承诺。有一个国家在提交的材料中特别援引捐助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见上文第 43 段)，这是大会第 2626(XXV)号决议规定的目标。尽管做出了这些承诺，捐助在过去几年里出现下降。在 COVID-19 危机之后，捐助很可能会进一步减少。秘书长报告说，2018 年官方发展援助净流量共计 1 490 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比 2017 年下降 2.7%，流向最需要援助国家的份额下降。¹⁰ 例如，欧盟援助中只有不到 10% 惠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¹¹ 研究还表明，在一些国家内部，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最差的地区所获得的资金更少。¹² 因此，特别报告员不仅对援助水平下降表示震惊，而且对援助缺乏针对性表示震惊。

83. 尽管如此，提交给本报告的材料表明，一些国家已经着手应对针对本国境内资源的挑战。各国认识到地域不平等的问题，分享了本国为使发展筹资和规划本地化而采取的措施(见上文第 37、48 和 60 段)。一个国家报告在其各地区均设立了发展中心(见上文第 64 段)。另一个国家提供了专门用于帮助市政当局了解和设计其自身发展计划的技术平台(见上文第 37 段)。这些努力有可能提高发展筹资的效率，因为它们可以让地方政府和社区共同努力，将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报告员鼓励各国和发展筹资机构采纳这些良好做法，并探索解决区域不平等问题的其他方法。

84. 特别报告员指出，必须改进这一领域分类数据的收集工作。《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三章专门论述了数据、监测和后续行动的必要性，一些国家在其提交的材料中提到在政府网站上公布数据(见上文第 44 和 57 段)。但是，各国向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交的报告表明，“大多数国家未能充分跟踪”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一些国家提供了国家一级的数据，但没有对数据进行分列。¹³ 各国要履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2030 年议程》承诺，就需要列出按

⁹ 另见行动援助组织，《谁关心未来：资助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服务！》，(2020 年 4 月)，第 72–73 页，以及《秘书长关于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特别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I.6)。

¹⁰ 《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第 29 页。

¹¹ Lucy Lamble 和 Karen McVeigh, “Less than 10% of EU aid reaches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study finds”, 《卫报》，2019 年 11 月 21 日。

¹² Amy Dodd、Marcus Manuel 和 Zach Christensen, *Failing to Reach the Poorest: Subnational Financing Inequalities and Health and Education Outcomes* (海外发展研究所和发展倡议，2019 年 9 月)。

¹³ Livia Bizikova, “Disaggregated data is essential to leave no one behind”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17 年)。

性别、年龄、残疾状况、收入、种族和族裔等分类的数据以及其他指标，以便将最需要的人作为发展筹资对象。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赞扬一个非洲国家加强其国家统计系统并改进其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报告的做法(见上文第 57 段)。

85. 国家提交的材料还反映出寻求私人融资以支持公共发展筹资的趋势(见上文第 27 和 50 段)。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回顾说，各国负有义务确保银行和投资者等参与发展筹资的私人行为体遵守《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规定的责任。根据收到的资料，特别报告员对服务的私营化或“金融化”(即将社会服务转变为盈利机会)的趋势表示关注。这通常发生在公私伙伴关系的背景下。

86. 虽然发展筹资机构建议各国将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私有化，但根据国际人权法，各国对社会服务负有主要责任(见 A/HRC/42/38)。此外，民间社会担心，这些伙伴关系可能导致侵犯人权，让穷人承担不成比例的相关成本。在一个已经将供水服务私有化的东南亚国家，外国自来水公司向居民收取的价格为全东南亚最高，尽管如此，居民得到的是使其致病的受污染的水。¹⁴ 在此背景下，强有力的监督措施对于预防和处理私人行为体的不当行为至关重要。

87. 关于良好做法，特别报告员欢迎一个国家在提交的材料中表示认识到公私伙伴关系的潜在弊端并介绍其使用替代办法补充国内收入的努力，包括实施税制改革(见第 28 段)。特别报告员鼓励这一努力，并鼓励探索其他方式以加强现有公共体系。

B. 税收政策

88. 特别报告员强调了发展筹资背景下的税收政策，因为发展筹资机构重视这些政策，且强调了其带来的将发展权纳入其中的契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税率相对较低，以及上文所述的官方发展援助比率下降，发展筹资机构强调收税是增加国内资源调动的重点。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数据显示，2018 年发展中国家的总税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8%，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发达国家则为 23%。¹⁵ 一个民间社会组织报告说，根据发展筹资机构的建议，各国经常采用递减税措施，例如激励企业和征收高消费税，这些措施在体制上是对穷人的歧视。¹⁶

89. 因此，在各国改革税制以努力增加用于发展筹资的国内收入时，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有可能采用累进税制，即对富人征收高于穷人的税率的制度，作为促进人权和减少不平等的工具(见 A/HRC/26/28)。《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22 段中承诺通过现代化的累进税制来加强收入管理。根据《发展权利宣言》第 3 条第 1 款，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家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

¹⁴ 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Promoting and Fulfill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 from Asia Pacific》(2019 年)。

¹⁵ 《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第 29 页。

¹⁶ 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提交给特别报告员的材料。

90. 近年来,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降低了最富有群体的所得税,同时提高了增值税等消费税。¹⁷ 研究认为,拉丁美洲的高度不平等与该区域的平均公司税税率从 1985 年的 43.9%降至 2015 年的 26.8%有关。该区域同期的平均一般增值税税率从 10.6%升至 15.2%。¹⁸ 使税制更具累进性的拟议解决方案涉及提高私营部门和富裕群体缴纳的税收比例,主要体现为提高公司税税率、财产税税率、财富税和金融交易税。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民间社会呼吁加强税收管理服务并成立专门负责执行对富人征税的税务管理单位。¹⁹

91. 关于增值税等消费税,这些税率对妇女和贫困人口的收入造成了过度负担,因为他们收入中用于支付这些税收的比例高于富人。民间社会的建议包括对贫困人口生活所需的基本食品、家用燃料、女性用品、药品和其他物品实施免税,这可能有助于解决税收影响过大的问题。²⁰ 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对医疗用品适用 0% 的增值税税率,这是该领域良好做法的一个实例(见上文第 49 段)。

92.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审查了收到的关于旨在吸引外国投资的免税期和特别规定的资料(见上文第 44 和 50 段)。虽然他理解吸引外国投资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他感到关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特别规定导致财政收入过低,从而阻碍了各国为社会保障网络编制预算的能力。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不会产生可观的收入。

C. 社区切实参与发展筹资

93. 关于包括资源调动和税收政策在内的发展筹资如何转化为个人和社区的实践,缺乏对决策进程的切实参与构成对落实发展权的重大挑战。特别报告员赞赏上述关于咨询社区意见的程序的信息(例如,见上文第 30、58、59 和 75 段)。然而,他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在发展筹资的所有阶段,即在政策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价阶段,没有将参与经费编入预算并使其制度化。

94. 在政策层面,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收到关于让社区参与制定发展筹资政策的信息。拉丁美洲的一个民间社会组织报告说,虽然政府就一些国家发展计划征求了该组织的意见,但政府将关于如何为这些计划筹资的讨论视为与民间社会无关的单独进程。²¹

95. 在项目层面,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信息表明,从一开始,社区就没有作为决策者参与关于是否为发展项目筹资的讨论。相反,开发银行、政府和公司经常在未

¹⁷ Isabel Ortiz、Matthew Cummins 和 Kalaivani Karunanethy, “Fiscal space for social protection and the SDGs: options to expand social investments in 187 countries”, 《扩大社会保障工作文件》第 48 号(国际劳工组织, 2017 年), 第 9-11 页。

¹⁸ 拉丁美洲财政政策中的人权原则和指导方针倡议, “Commentaries to the OECD call for public input on the tax challenges of digitalization, and possible solutions” (2019 年 3 月 6 日)。可查阅: www.cesr.org/sites/default/files/OECD%20March%202019%20-%20EN.pdf。

¹⁹ 行动援助组织,《谁关心未来》,第 80-81 页。

²⁰ 同上,第 86 页。

²¹ 拉丁美洲债务与发展网, 2020 年 5 月 29 日提供的信息。

听取当地社区意见的情况下提出项目。因此，社区在发展项目已经启动之后才得知这些项目。²² 例如，在某个东非国家的一个社区，当周围的居民区开始被拆除时，居民才得知自己正因道路扩建项目而被迁离，而此时被迫迁离通知尚未发出，也并未提供搬迁地点。²³

96. 在政府和发展筹资机构未通知的情况下，社区和民间社会如何获取有关发展筹资的信息以促进切实参与是另外的挑战。例如，一个民间社会组织报告说，可能很难了解为一个特定项目提供资金的是哪些投资者，是私人投资者还是公共投资者。²⁴ 这可能是因为使用了金融中介机构，也可能是因为拟开展项目的现场没有提供联系信息。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鼓励采取上述良好做法，即创建一个网站，列出一个国家所有的公私伙伴关系(见上文第 27 段)，但这不包括完全私人的项目或完全公共的项目。

97. 一个东非国家报告说，在该国各省举办了关于新的筹资立法的信息讲习班(见上文第 26 段)；可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举办关于潜在发展项目的地方讲习班。将这项措施与传播广大民众可以理解的信息相结合，可能有助于解决人们提出的另一个关切：发展筹资信息的技术性可能使其遥不可及。²⁵ 民间社会还报告了没有翻译成少数族裔和(或)土著语言的问题。在上述道路扩建案中，发展筹资机构在开始迁离居民三年后才宣布把一些项目文件翻译成一种当地语言。²⁶

98. 特别报告员还感到关切的是，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妇女、儿童和青年、少数族裔、土著人民、非洲人后裔以及其他被剥夺权利或边缘化的群体的成员经常被排斥。他收到报告说，尽管弱势群体因发展项目而受到伤害的风险更高，但发展筹资机构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咨询。例如，民间社会组织报告了发展项目导致少女受到性虐待和辍学的案例。²⁷

99. 针对这种没有通知或没有与社区和弱势群体协商的情况，民间社会组织建立了一个预警系统，提醒社区注意可能影响他们的发展项目。²⁸ 该系统提供有关项目的信息以及关于支持社区应对的资源。这一民间社会倡议因此承担了发展筹资机构的义务，但各社区由于被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而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即使在社区和民间社会得知一个项目之后，政府或发展筹资机构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

²² 抗衡联盟，“反向发展——第 3 集：尼泊尔马赛甘迪走廊”(2019 年 2 月 28 日)，以及问责律师，提交给特别报告员的信息。

²³ 抗衡联盟，“Development in reverse: episode 2 – the Mombasa road”(2019 年 2 月 21 日)。

²⁴ 银行信息中心，2020 年 5 月 6 日提供的信息。

²⁵ 拉丁美洲债务与发展网，2020 年 5 月 29 日提供的信息。

²⁶ 抗衡联盟，“Development in reverse: episode 2”。

²⁷ 银行信息中心，“Uganda Transport Sector Development Project”，可查阅：<https://bankinformationcenter.org/en-us/project/uganda-transport-sector-development-project-tsdp>，以及问责顾问，2020 年 5 月 8 日提供的信息。

²⁸ 见 <https://ews.rightsindevelopment.org/>。

能回应关切或补救已经发生的伤害。一个案例是加勒比海某国的一个社区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斗争，才得以对资助该项目的发展筹资机构提出申诉。²⁹

100. 在发展筹资带来伤害而非福祉的情况下，各国负有责任确保起诉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当私人行为体或国际金融机构侵犯人权时。³⁰ 虽然一些发展筹资机构设立了问责办公室，可以接受关于项目的投诉，但民间社会发现了问责方面的短板，特别是在亚洲一些较新的发展筹资机构中，这些机构没有建立关于获得补救的投诉机制和(或)相应政策。³¹

101. 虽然这些挑战很严峻，但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信息表明，增强社区和弱势群体参与发展筹资领域决策的能力对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都有好处。一个好处是，各社区可以提供关于当地情况的有价值的传统知识和信息，这可以使公众认为项目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另一个好处是，如果社区参与整个实施、监测和评价阶段，它们可以提醒筹资机构注意项目期内出现的问题以及项目可以改进的领域。³²

四. 结论和建议

102. 要在发展筹资领域实现发展权，各利益攸关方必须共同努力迎接挑战，调动足够资源并将其分配给最需要的人。通过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建立累进税制，各国可以履行其义务，使用于发展的资源最大化。通过与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合作，各国和发展筹资机构可以将个人和社区置于发展筹资决策进程的中心，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受益。为了在这些领域切实落实发展权，特别报告员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A. 资源调动

103. 特别报告员敦促捐助国信守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并建议它们向最需要援助的人提供援助。

104. 在国家内部，政府应将最多的资源分配给最贫困的区域和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妇女、儿童和青年、少数族裔、土著人民、非洲人后裔以及其他被剥夺权利或边缘化的群体的成员。

105. 为了解决区域不平等并更好地促进社区层面的参与，各国和发展筹资机构应通过建立地方发展中心和为市政当局提供技术支持平台，将发展筹资本地化。

106.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改进其分类数据收集工作，以确保将最需要的人作为发展筹资的目标。

²⁹ 问责顾问，2020 年 5 月 8 日提供的信息。

³⁰ 《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原则 1。另见 E/C.12/1/Add.68 号文件，第 31 段。

³¹ 问责顾问，2020 年 5 月 8 日提供的信息。

³² 同上。

107. 各国应确保银行和投资者等参与发展筹资的私人行为体遵守《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规定的责任，为此政府需提供强有力的监督并起诉侵犯人权行为。

B. 税收政策

108.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建立累进税制，作为消除经济不平等的工具。在改革税收制度时，各国应降低增值税税率并扩大免税项目清单，使贫困人口仍然负担得起所需要的商品。

109. 各国应终止针对外国投资者的免税期和特别规定。各国政府应加强税收管理，设立专门负责执行对富人和企业征税的单位。

C. 社区切实参与发展筹资

110. 特别报告员敦促发展筹资各利益攸关方建立将权利持有人置于发展筹资决策中心的机制并为其编制预算。他具体指的是财政部、规划部和发展部、中央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和基金。

111. 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区域和国际发展筹资机构的成员，各国还必须保证这些机构制定让权利持有人切实参与的程序。

112. 发展筹资机构必须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发布有关潜在项目的信息，使社区和民间社会能够参与关于是否应资助项目的决策。应该以广大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将这些信息翻译成当地语言。还应以残疾人能够获取的方式提供这些信息。

113. 发展筹资各利益攸关方应让残疾人、妇女、儿童和青年、少数族裔、土著人民、非洲人后裔以及其他被剥夺权利或边缘化的群体的成员参与发展筹资进程，以避免造成伤害并分享惠益。

114. 在启动项目时，发展筹资机构应与受影响的社区保持联系，并在整个实施、监测和评价阶段继续促进社区参与，以便社区能够报告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提出改进项目的建议。

115. 发展筹资机构应与民间社会合作，建立问责机制和制定政策，以保证在造成伤害时进行补救。

116. 联合国各机构和国际组织让会员国参与发展筹资时，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下，应倡导和支持权利持有人切实参与决策进程。

117. 民间社会应继续倡导和支持社区切实参与发展筹资进程。

118. 民间社会应坚持对发展筹资机构问责，责成其向社区通报将对社区产生影响的发展筹资项目，并在造成伤害时协助进行补救。